

教学用书
内部参考

人物小传

一九八一年七月

目 录

毛泽东.....	(1)
附：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 问题——黄克诚.....	(7)
周恩来.....	(25)
刘少奇.....	(29)
朱 德.....	(33)
任弼时.....	(36)
董必武.....	(39)
彭德怀.....	(42)
贺 龙.....	(45)
陈 毅.....	(48)
罗荣桓.....	(51)
林伯渠.....	(53)
李富春.....	(55)
王稼祥.....	(57)
张闻天.....	(58)
陶 铸.....	(61)
李大钊.....	(63)
瞿秋白.....	(67)
蔡和森.....	(70)
向警予.....	(74)
邓中夏.....	(76)
苏兆征.....	(79)

彭 湃	(82)
陈延年	(85)
恽代英	(86)
赵世炎	(89)
张太雷	(91)
李立三	(94)
方志敏	(96)
刘志丹	(99)
黄公略	(101)
许继慎	(103)
韦拔群	(103)
赵博生	(106)
黄振堂	(108)
段德昌	(109)
杨靖宇	(110)
左 权	(113)
叶 挺	(114)
宋庆龄同志伟大光荣的一生	(118)
蔡元培	(129)
鲁 迅	(136)
廖仲恺	(140)
何香凝	(151)
邓演达	(162)
杨杏佛	(170)
沈钧儒	(177)
邹韬奋	(190)

郭沫若	(192)
茅 盾	(194)
李四光	(198)
闻一多	(198)
杨虎城	(206)
陈嘉庚	(212)
张治中	(221)
付作义	(221)
白求恩	(222)
史沫特莱	(223)
斯特朗	(224)
柯棣华	(225)
斯 诺	(226)
浅沼稻次郎	(227)
中岛健藏	(227)
(113)	对 立
(114)	辩 论
(115)	坐 一 函 策 决 大 群 志 同 德 共 求
(120)	群 示 蔡
(121)	丘 普
(122)	群 中 德
(123)	群 杏 何
(124)	群 杏 何
(125)	群 杏 何
(126)	群 杏 何
(127)	群 杏 何
(128)	群 杏 何
(129)	群 杏 何
(130)	群 杏 何

毛泽东

毛泽东，字润之，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富裕农民的家庭。

毛泽东同志八岁上私塾读书，十三岁后在家从事农业劳动。在劳动中，他目睹农民受压迫剥削的困苦生活，十分同情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十六岁时，到湘乡县立东山高小读书，学到许多新的知识，同时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

一九一一年，毛泽东同志到长沙考入驻省湘乡中学。这年，辛亥革命爆发，他满怀热情投入湖南新军，当一名普通士兵。不久，由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他决心继续读书，以学习新的知识，探求中国的出路。一九一三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一师期间，他学习异常勤奋，且讲求实践，也很重视体格的锻炼。一九一七年夏，曾步行到长沙、宁乡等县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农村情况。同年冬，担任一师学友会举办的工人夜校的“管理”兼讲授历史课，通过这项工作，取得了联系工人的初步经验。这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夜，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的残暴统治，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都大大激发了他反抗军阀的斗争意志。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努力探求救国的真理。一九一八年四月，他和蔡和森同志团结一批进步青年，发起组织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进步青年团体“新民学会”。这年夏天，他从一师毕业。九月，为组织进步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去北京，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在李

大钊同志等人的帮助下，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接触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并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进行社会调查。

一九一九年三月，毛泽东同志回到湖南。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湖南立即响应，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发动群众进行游行示威和宣传；推动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开展长沙等地的反帝爱国运动。为推动革命斗争向前发展，同年七月，创办了革命刊物《湘江评论》，热情歌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宣传社会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他亲自撰写《创刊宣言》和《民众大联合》等内容深刻的文章。《湘江评论》被军阀政府查封后，他继续在报纸和刊物上发表文章揭露军阀的黑暗统治，他还积极领导了驱逐反动军阀张敬尧的斗争。这年底，他第二次到北京，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初步建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翌年七月返回长沙，创办“文化书社”，促进马列主义的广泛传播，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引导青年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后，他多次同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同志通信，讨论确定正确的建党思想。

一九二一年七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派代表，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同志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会议。会后，回到湖南，建立中共湖南支部，后改建为中共湘区委员会，任书记，并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在湖南，他积极领导工人运动，发动多次工人的罢工斗争；领导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后又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培养革命骨干。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成立，他当选为首任总干事。

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同志离开湖南到上海，不久，

即赴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次年一月，再次到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会后到上海，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与恽代英、向警予、邓中夏等同志一道努力贯彻党的“三大”决议，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一九二五年春，毛泽东同志回到湖南，亲自调查农村政治经济情况和农民的革命要求，发动韶山地区的农民斗争。同年十月，第三次去广州，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主编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大力宣传工农革命运动，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面目。次年五月，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农民运动骨干。这时，革命形势迅速发展，阶级斗争日愈尖锐，他发表了著名论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正确提出分清敌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同年冬天，他到达武汉，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十二月，应邀参加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会后，考察了湘潭等五县的农民运动，于翌年春回武汉，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高度赞扬农民的革命行动，痛斥了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污蔑和攻击。一九二七年三月，在董必武同志等的支持下，创办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全国训练农运干部。在此期间，他任全国农协常委兼组织部长，全力指导全国农民运动。一九二七年四月，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和任弼时同志等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批判，提出开展农民土地革命、大力武装农民等挽救革命的提案，但均遭陈独秀拒绝。

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八

七会议），毛泽东同志出席这次会议并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赶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任前委书记。九月，起义爆发，他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率领工农革命武装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井冈山进军，开始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来到井冈山，两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同志任党代表。此后，他和朱德同志等率领这支军队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并粉碎蒋介石的多次反革命“围剿”，发展和巩固了这块根据地。在这一系列斗争中，他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总结各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写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光辉著作，系统地 from 理论上阐明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政权的道路。这期间，在军事的战略战术、土地革命、建党建军以及根据地的建设等方面，毛泽东同志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成立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毛泽东同志当选为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毛泽东同志被排斥出军队的领导，但他仍努力从事领导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长征途中，他和周恩来、朱德同志等粉碎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率领红军打破蒋介石

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抗日前线。之后，又及时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正确解决“西安事变”，实现了国内和平，为实行全民族抗战创造了条件。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同志等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制定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整套方针、政策，领导了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和全党整风运动，使党更加团结、巩固，坚持了持久抗战。这期间，毛泽东同志以极大的精力从事理论工作，科学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提出中国人民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制定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和政策，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一九四五年四月，他亲自主持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在这次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为争取和平民主，粉碎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夺取全国政权进行了英勇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妄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一面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内战；一面又玩弄“和平”阴谋。为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等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亲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有力地揭露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团结教育了广大人民。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指挥人民军队用三年多的时间彻底摧毁了蒋家王朝。这时期，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党多年来实际斗争的丰富经验，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总路线和土地革命总路线。一九四九年三月，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

举行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提出党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任务。同年九月，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十月一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恢复国民经济、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在一九五〇年六月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他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制定党在当时的战略方针。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我国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好转。一九五二年底，他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领导全国人民胜利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他还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指导。他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四清”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幸。在党的第八、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第八届、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同志因病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三岁。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他在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上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

（引自四川师院政教系《中共党史人物介绍》第一辑）

关于对毛主席评价 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黄 克 诚

如何认识和评价毛主席、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曾经代表中央就这个问题表示过原则的意见。小平同志多次讲，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小平同志还说过，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在谈到他晚年的错误时，小平同志说，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也是有责任的。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小平同志的这些原则意见是代表中央讲的，我完全赞成。我认为，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本着这些精神去考虑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前一段时间，曾经有些同志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比较偏激，个别人甚至放肆地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同志。这种态度使我很忧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这个问题，我有责任讲讲自己的看法。为了有助于理解小平同志讲述的那些原则，我想先讲点历史。

在创建红军时期，毛主席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

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期，湖南农民起来革命。当时

党中央的多数领导人和中层以上社会的舆论都反对湖南农民运动，象去湖南解决农民问题的谭平山等人就讲农民运动过火了，陈独秀也这样讲。只有少数人能够坚持革命立场，支持农民运动，并且只有毛主席经过实地调查写了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地赞扬湖南农民运动，把对农民运动的态度问题提到原则的高度，驳斥了各种非议。这就使很多革命的共产党员对这个重大关键问题，在思想上武装起来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作用确是了不起的。

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八·七”会议上，党中央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并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搞武装暴动。毛主席被派到湖南，在浏阳、平江一带发动秋收暴动，原来准备进攻长沙。暴动时来了原武汉国民政府的一个警卫团，团长是我们党的一个很好的同志卢德铭。他带着队伍辗转到达修水一带，与毛主席取得了联系。罗荣桓同志等在崇阳、通城等地领导农民暴动，也组织了小小的队伍。此外，还有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萍乡、安源的工人自卫队和醴陵的起义农民等。毛主席将这些队伍收集起来，组织了平江、浏阳、醴陵的秋收起义。但是进攻长沙的计划未能实现。毛主席看到平、浏地区离长沙太近，大的部队在这里难以长期立足，便决定放弃占领中心城市的方针，向井冈山进军。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

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主席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到了井冈山以后，他就提出了纲领，着手建立罗霄山脉中段革命政权，将红旗在井冈山打起来。秋收暴动中，湖北、黄麻、江西、湘鄂西以及其他很多地方都有暴动。但由于经验不足，多数被敌人镇压下去了，有些地方把武器埋

了。公开打着红旗坚持下来没有垮的，主要的是毛主席领导的这一部分和方志敏同志在赣东北领导的一小部分武装力量。

井冈山的红旗不倒，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希望，关系重大。大家看到还有一支武装力量能够站住脚，这就使许多共产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极端险恶的情况下，受到了很大鼓舞，增强了革命的信心。那些把武器埋起来的地方又把武器取出来再干。

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是我们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参加南昌暴动的有三万多人，后来在汤坑、三河坝等地打了败仗，队伍几乎打光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收集了余下的官兵八、九百人，改编为一个团，以后又搞了湘南暴动，扩大了武装，比毛主席领导的兵力多。但是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这面红旗在井冈山，没有毛主席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朱德、陈毅同志所领导的队伍要坚持下来也是很困难的。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同志英勇地领导了平江暴动，暴动以后奉命留下黄公略和几个同志带着少数武装坚持平江、浏阳斗争，彭德怀和滕代远同志带着主要的部队也上了井冈山。他们把毛主席建立革命政权、建立根据地、建党、建军等等一套东西学到后，又回到平江、浏阳一带，发展了湘鄂赣根据地。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同志领导的广州暴动失败后，由袁国平、叶镛、陆更夫等同志把剩下的部队带到海陆丰去了。这是一支很硬的部队，保存了党的组织，有很多共产党员，大部分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学生，政治素质、军事技术都很好，比毛主席和朱德同志的那两支队伍基础都好。领导海陆丰斗争的彭湃同志，是一个很

优秀的同志，海陆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是一个很好的根据地，群众基础非常之好。但是，由于没有一条正确的军事、政治路线，加上受到党内一些悲观情绪的影响，把外地人员从苏维埃根据地遣散回家，结果这样硬的部队，这样好的政权都失败了。为什么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比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的力量都小，也经历过曲折，受过损失，却能首先在井冈山独立生存下来呢？这是因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对于红军、红色政权能不能存在和发展，怎样才能存在和发展这些关键问题，只有毛主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正确地解决了。鄂豫皖、湘鄂西等地的红军后来有很大的发展，也是和井冈山红旗的影响分不开的。

毛主席当时在政治上、军事上创造了一套路线、方针和政策，现在看来似乎很简单，但那时大家都没有经验，能搞出这么一套正确的东西就非常困难呀！那时的党中央，包括六大以前和六大以后，就没能搞出这一套。毛主席当时比我们确是要高明好多倍。我再举个小例子。我到井冈山后，毛主席提出军队不能发饷了，要搞供给制。我当时想：这个办法行得通吗？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很多战士不发饷怎么行呢？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几十块大洋。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我有些怀疑。可是后来，这个办法居然行通了。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井冈山开始时期，队伍比较小，打土豪打得比较多，每个人一个月还可以发三块钱。一两个月以后土豪打得差不多了，钱来得少了，就每人每月发一块钱，以后发五毛。后来连五毛也发不起了，每个人一

天只发五分钱的伙食钱，包括油、盐、酱、醋在内。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部队不仅没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强，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别人是提不出来的。

总之，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这个最危险的历史转折关头，毛主席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很明显，没有他的坚苦卓绝和富有远见的奋斗，没有他所领导树立的井冈山这面红旗，很难设想中国革命将会是什么样子。毛主席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功绩谁能比得了呢？哪个有这样大的贡献呢？如果有人硬要说任何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只能是对历史开玩笑！

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首先是由于毛主席的正确决策

一九二九年二月，在上海的党中央，曾经指示朱德、毛主席离开部队到上海去，要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全部分散，减少目标。这时正处在革命低潮。毛主席答复中央说：我们离开不得，离开了部队就会散掉；如果一定要我们离开，那就请派恽代英、刘伯承同志来代理我们的工作。后来，军阀战争很快爆发，形势就变了。毛主席的“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那首词，就是这时写的。在这关键时刻，如果不是毛主席坚持正确主张，部队会落到什么结局就很难说了。

一九二九年红军主力在闽西，这时党内发生过一次关于一些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这次争论我没有参加，但罗荣桓同志、陈毅同志曾经同我详细谈过。那时争论很激烈，争论的结果，多数人不赞同毛主席的意见。他的前委书记当不成

了，只好休息养病。后来红军的战斗活动很不顺利，于是又去请毛主席出来，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主要部分就是《毛泽东选集》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那篇文章。这个决议解决了党内思想上、路线上的许多关键问题。毛主席在我们党和军队生死攸关的问题上作出的正确决策，对我党我军的建设起了伟大的作用。有的人现在说古田会议好像不是毛主席领导的，这不是历史事实。一说毛主席有错误，就好像什么正确的事情都不是他干的，错误的事情就都归他，这怎么行呢！

一九三〇年，立三路线来了，想集中红军的主力夺取武汉。那时，红军形势很好，在江西占领了十几个县，赣西整个地区都被红军控制了。许多同志主张先打开南昌，再打武汉。在这急需作出重大决策的时刻，毛主席敏锐地看出了形势变化的苗头。他判断军阀战争很快就要停了，蒋介石会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这个问题当时只有他看出来了。他就通过周以栗同志向红三军团做说服工作，不要冒险打南昌，部队要迅速东过赣江回到老根据地，当敌人进攻时再消灭他。经过一个多月的争论，才把红三军团的领导同志说服，将部队撤回老根据地。那时，我们的侦察工作很差，毛主席就是通过看报纸，分析出国民党要向我们大举进攻。这又是一个关键性的决策。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首先就因为有了这个正确决策。如果当时不回到苏区，而在敌占区同敌人作战，那么情况怎么样就很难说，很可能要受严重损失。

一九三一年，江西红军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诱敌深入”

的方针，粉碎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以后，党中央派项英等同志来到苏区，组成中央局，下面建立了军事委员会。项英同志当了中央局的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撤消了以毛主席为书记的一方面军总前委。紧接着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就来了，蒋介石采取“步步为营”的方法，筑堡前进。项英等同志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他们主张跑，要离开苏区，把红军带走。开始，只有毛主席一个人反对项英等同志的逃跑主义，反对离开苏区，主张就地打仗。争论了大约有一个多月，后来得到较多的人支持，但也没有做出什么结论。可是敌人已经进到了江西的富田和东固之间的大山上，修起了堡垒，情况非常紧急。毛主席就果断地下令出击，一下子把敌人的几个师消灭掉了。他的《渔家傲》词里面说：“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就是写的当时的情况。如果实行项英等同志的办法，那就糟糕了，根据地就会丢掉，红军就会陷入困境。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的决策又比别人高明，这是明摆着的历史事实。这段历史他自己没有讲过，别的人也没有讲，所以，现在很多同志都不知道。到第三次反“围剿”时没有争论了，完全听毛主席的。因为经过前两次反“围剿”，他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革命就受到重大损失

一九三一年，粉碎第三次“围剿”后，“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中央的多数同志从上海到了中央苏区，组成了中央局，领导整个中央苏区的斗争。这时形势非常好。一方面，三次“围剿”被粉碎后，毛主席把红军的主要力量用来